

高等教育信息

2024 年第 11 期（高教信息总 44 期）

发展规划处（质量评估处、高教研究所）编

2024年11月30日

● 教育资讯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

国家发改委：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经历快增、短平、陡降三个阶段

教育部：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

教育部部署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教育部：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

教育部、人社部部署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2025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43万人

中办 国办：推动高校加强物流、采购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

国家发改委：引导院校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

安徽高校专业调整对接产业图谱

● 专家论道

刘振天：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向何方突围？

张薇薇，王魁平：分类评价引导高校特色发展的上海实践探索

● 审核评估专栏

审核评估限期整改！多所高校交出答卷

【教育资讯】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

11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谈到“双一流”建设是否会扩大建设规模时表示，《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已经明确，将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教育部坚决贯彻落实，将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研究具体方案。计划分两步开展工作。第一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强化人才培养核心地位，引导建设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第二步，根据“双一流”标准，结合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建设范围。

怀进鹏表示，关于“双一流”建设的规模，一直是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第一轮建设140所学校，已经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47所地方高校。第二轮又增加了7所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以来，带动了一大批地方高校发展，同时，教育部还组织“双一流”高校对中西部高校进行组团式帮扶，不仅建设一批，还要培育一批。所以下一步“双一流”高校不仅是在招生扩容上，还要体现在组团帮扶中，以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2024年11月07日）

国家发改委：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经历快增、短平、陡降三个阶段

11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在谈及适当扩大“双一流”建设规模的问题时表示，今后一段时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经历快增、短平、陡降三个阶段。人口阶段性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布局、投入都是一个挑战，既要满足孩子们“上大学”的需求，又要尽量减少适龄人口达峰后的资源闲置，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考验。

郑栅洁指出，适龄人口达峰前，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的供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与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一起，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重点，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从五个方面入手，继续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一是建设新宿舍。许多高校包括“双一流”高校现在学生宿舍不够、条件也不好，还有很多6人间甚至8人间，学生和家長很不满意。有必要积极支持高校通过新建、改扩建等多种方式尽快补齐学生宿舍这个制约高等教育资源扩容的短板。

二是建设新校区。布局建设一批“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新校区，支持高校扩大办学规模，为新增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展空间。

三是建设新大学。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省份新建若干新型研究型大学、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学。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尽快形成优质学位供给能力。

四是建设新平台。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建设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布局一批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为高校持续提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创造条件。

五是建设新学科。引导高校适应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快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健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适配的机制。

郑栅洁表示，在做好这五个方面工作的同时，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一起积极研究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加强高等教育资源的前瞻布局，做好资源的优化配置。

（来源：中国教育在线 2024年11月07日）

教育部：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

11月14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4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有关情况。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11133所，在校生近3500万人，形成了中职、专科、本科完整的层次体系。

彭斌柏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和模式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格局性变化。

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3年，我国共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11133所，在校生近3500万人，形成了中职、专科、本科完整的层次体系。在发展规模上，职业教育分别撑起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近年来，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已经成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的主阵地。

深入推进“一体两翼五重点”战略任务。职业教育战线认真落实2022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省级层面，教育部分别与天津、山东等9个省份共同开展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工作，落实省级政府领导和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市级层面，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主要经济功能区，建设了34家市域产教联合体，提升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与区域发展的紧密度。行业层面，推动职业教育围绕重点产业，建设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适配度。实施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职业教育关键要素改革，努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4年11月14日）

教育部部署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各地各高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建设行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通知》强调，要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适配。加强就业市场需求分析研判，及时掌握就业市场需求变化，编制发布人才需求报告和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主动布局新兴学科专业，扩大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布点，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作为高校办学资源配置、教学质量评估、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

《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促就业政策的引领作用。加力落实助企稳岗促就业政策，加大促就业政策宣传解读。优化规范招聘安排和秩序，统筹协调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录)高校毕业生和各类升学考试时间安排，做好大学生征兵工作。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关支持政策研究。

《通知》强调，要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深入开展“访企拓岗”行动，落实“两个100”和“不少于10家”要求，足质足量开拓就业岗位。充分用好校园招聘主渠道，拓展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支持二级院系积极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小型专场招聘活动。开展民营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专项行动，支持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创新挖掘基层就业空间，组织实施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基层项目，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支持各地开发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农业科技等岗位。全面推广使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建立就业信息归集机制，推进国家、省级、高校三级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互联共享，加快就业服务智慧化升级。

《通知》强调，要做实做细就业指导帮扶。强化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完善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课程体系，打造一批名师金课及精品教材，办好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探索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专业微课程、职业培训课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加强就业育人与观念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

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创业。健全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组织实施好“宏志助航计划”。完善就业实习实践制度，推动更多毕业生通过实习实践实现就业。

《通知》强调，要持续推进就业监测与综合评价改革。加强就业进展监测，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分级开展就业监测数据自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深入推进就业评价改革，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就业评价体系，全面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为教育教学评估、就业工作质量评价提供参考。

《通知》要求，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保障水平。各地各高校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民生头等大事、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保障，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四到位”要求。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和权益维护，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4年11月13日）

教育部：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

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4年12月21日至22日举行。据统计，**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

近日，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召开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动员和部署做好考试安全工作。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何光彩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网信办、中央保密办（国家保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有关部门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是重要的国家教育考试。各地、各有关部门、各招生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准确把握研考工作面临的风险挑战，切实扛起政治责任，聚焦关键问题，全力确保研考安全。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各招生单位要强化风险意识，联合开展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加强风险源头防控，提高风险处置效率，积极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强化安全保密，坚持最严标准狠抓安全保密落实，守牢试题试卷安全底线。强化部门联动，加强安防体系建设，严格考生入场检查和考场管理，全力维护考试安全秩序。强化应急处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应急演练，快速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强化服务保障，加强宣传咨询服务，积极提供合理考试便利，竭诚为考生办好暖心实事。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各招生单位要强化政治担当，按照“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工作要求，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部署落实、督促检查，确保研考安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会上，北京市、山东省、重庆市、四川省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高校招生委员会及教育等部门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4年11月21日)

教育部、人社部部署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2025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43万人

11月14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落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总结工作、分析形势，对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俞家栋，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何光彩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部门、各地区、各高校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强化政策保障、持续拓展岗位、推进就业育人、完善监测评价，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各地各高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使命和定位，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数量、专业结构提出的更高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形势和条件，树立新时代大教育观、大就业观，跳出教育看就业、立足全局看就业、着眼长远看就业，推动思想观念、工作重点、组织方式、评价机制转变，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全力促进2025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会议强调，各地各高校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优化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加强就业质量评价反馈，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全面提质升级，促进人才供需适配。要进一步发挥政策引领效应，优化规范政策性岗位招录安排，加大市场化就业渠道拓展力度，开发更多基层就业岗位，深化访企拓岗专项行动，支持保障灵活就业和创新创业。要进一步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强化就业育人，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推动数字赋能服务，实施好“宏志助航计划”就业能力培训项目，做好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要进一步保障毕业生就业权益，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数据监测核查，切实维护就业安全。要逐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会议要求，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力挖掘市场岗位新增长点，全力稳住公共部门岗位，有力引导毕业生城乡基层就业，着力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要提升就业服务效能，做实离校前后服务衔接，做优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做好就业服务和人才引进统筹，健全服务支撑。要加大能力培养力度，强化求职能力训练，加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着力促进毕业生人岗相适。要维护就业合法权益，加强岗位信息审核，强化市场秩序监管，切实防范就业风险。

会议强调，要以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为契机，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大力度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要加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优质企业培育，稳住市场化就业渠道。要持续开展重点领域产业人才需求预测，为高校学科专业优化布局提供参考，推动人才供需精准对接。

河南省教育厅、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国海洋大学、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中国一重集团作交流发言。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中央编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国资委、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来源：教育部网站 2024年11月15日)

中办 国办：推动高校加强物流、采购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强化专业人才培养。推动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加强物流、采购、供应链等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深化与国内外物流企业合作，打造集人才培养、研究创新、服务企业于一体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鼓励物流企业、行业协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等，开设面向物流实践的培训课程，完善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来源：新华社 2024年11月28日)

国家发改委：引导院校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

1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11月份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谈及家政人才和从业人员培养方面的问题时

表示，要加强家政人才教育培养，引导院校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并合理安排招生规模。

李超介绍，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快速发展，目前市场规模已超万亿，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3亿、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3200万，养老、育幼等领域家政服务需求正在持续释放，初步估算家政用工缺口超过2000万，其中，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高素质家政服务人员短缺问题尤为突出。为推动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关于深化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的意见》，以产教融合促进家政教育培训、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需求衔接，增加高水平家政人员供给，更好满足群众对高质量家政服务的需求。《意见》提出四个方面的安排。

第一，加强家政人才教育培养。这项工作主要依托各类院校开展。**高等教育方面**，引导院校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市场急需的家政相关专业，并合理安排招生规模；**职业教育方面**，重点是扩大家政教育专业教师规模，鼓励学校与家政企业师资互聘兼职；**继续教育方面**，重点是有序推动家政相关专业纳入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清单，鼓励更多从业人员接受学历继续教育。

第二，加强从业人员技能提升。主要开展3方面工作。一是指导家政企业建立岗前、在岗、转岗等全链条全员培训制度，做到培训合格再上岗、每两年至少“回炉”培训1次。二是抓紧制订修订、实施应用家政服务业相关标准。三是加强“巾帼家政”、工会家政、“国开家政”等家政培训品牌建设，预计每年培训家政从业人员、培训师资、职业经理人等超60万人次。

第三，完善家政产教融合载体。推动各地细化“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举措，支持培育家政产教融合型企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建设家政实训基地；同时，支持有关行业组织、学校、机构、企业等共同组建家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一批平台载体，为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第四，赋能家政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家政企业深度参与院校的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促进人才培养匹配市场需求，支持家政企业与相关院校建立稳定的就业对接机制，推动家政人才高质量就业。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家政领域应用，鼓励各地吸引养老、托育、物业、酒店等相关领域大型企业进入家政行业跨界经营。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抓好《意见》实施，不断提升家政从业人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

（来源：新华社 2024年11月28日）

安徽高校专业调整对接产业图谱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安徽省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省属高校与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专业点占比达64.9%，较2021年提升24.9个百分点；服务新兴产业的新增专业点占比达82.2%；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专业点共计1846个；通过试点改革开设153个“微专业”；试点建设安徽高等研究院……人才培养紧密跟进产业发展布局，正成为安徽高等教育发展的鲜明特色。

专业持续“上新”

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人才培养就跟进到哪里”，安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重点围绕服务安徽省十一大新兴产业，设置新兴产业发展、重大民生急需、填补安徽省空白点的学科专业。

近年来，安徽围绕合肥等城市布局集成电路产业。作为省属高校，安徽大学紧密对接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重组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设计、封装等方向专业。

对接产业链需求不断完善教育链，安徽大学聚焦集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强化材料科学与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布局建设13个高峰学科，新增13个“四新”专业，撤销12个老旧专业。

在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储常连看来，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是满足新技术、新产业、新知识对人才培养新需求的具体举措。

2022年，安徽印发《深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改革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省高校服务安徽省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比例要达到70%以上。

安徽实施高峰学科建设，持续支持一批建设目标明确、对接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学科，形成布局合理、高峰凸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的良好学科生态。

截至目前，安徽省现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1所，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3所；现有学术学位博士点120个，专业学位博士点21个；学术学位硕士点223个，专业学位硕士点318个，其中紧密服务新兴产业的学科点468个，占比68.6%。

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动态调整，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和创新。

提升软硬件实力，培养理实交融人才。在黄山学院集成电路工艺及可靠性实训中心，集成电路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分成10个小组，忙碌在工艺测试、刻蚀清洗、可靠性测试等不同环节，通过实践学习了解芯片制作的各个工艺环节。

“这是安徽省内第一条面向高校学生和企业工程师培养的实体工艺线，可以完成集成电路工艺制造和可靠性分析全部环节的实体操作。”黄山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吕海江告诉记者，目前实训中心不仅可以服务于本省的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培养，还在今年暑期承接了外省的师资培训。

“学院重视学科调整后的师资力量建设。”黄山学院教务处处长方辉平说，对于新增专业在人才引进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对于停招专业的教师给予三年过渡期，降低其教学工作量要求，支持参加培训、进修等，助力教师平稳转型发展。

校企深度融合，培养产业急需人才。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不断优化课程内容和学分制度，增加实践环节学时。自2021年成立以来，共聘请44位业界导师参与本科毕业设计、研究生论文指导等，紧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调整学生培养方向。

作为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合肥大学于2023年2月成立大众学院。学院超过一半的专任授课教师来自大众汽车集团，所设“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精准对接企业人才需求。通过设置学校、企业两种学习场景，帮助学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反复交融，提升将理论知识应用到企业实践的迁移能力，为企业培养“最需要的人才”。

探索建设平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2023年7月，教育部支持建设安徽高等研究院，以有组织科研创新促进有组织人才培养，培养造就大批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三地一区”建设。

研究院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目前已形成总院和合肥、芜湖、阜阳、淮北分院的“1+4”组织框架，后期将根据实际情况拓展。截至今年6月，已完成首批735名硕博研究生招生，共遴选71家企业、39所高校、207个项目，将成为安徽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载体和重要平台。

贯通“专业—产业—就业”最短通道

为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提升高校服务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安徽高校探索开设“微专业”。

秉承“旅游、生态、徽文化”办学特色，黄山学院开设会展数字创意与策划、民宿康养与数字化运营管理、数智营销与直播电商等7个“微专业”。该校酒店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徐玉鹏，本学期报名参加了民宿康养数字化运营管理“微专业”课

程，上了一段时间课后，他觉得“自己选对了”：“课程全是实际操作的干货知识，比如怎么做民宿运营的短视频、怎么通过直播的方式宣传民宿。”

今年，合肥大学大众学院增设了智能网联汽车“微专业”，围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人才核心素养和创新型人才综合能力，打造大众汽车文化、车辆构造、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汽车电控等一批课程，培养行业急需的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人才。

“根据产业人才需求，增设或调整相关课程作为‘微课程’，由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发模块化课程。”储常连说，目前安徽高校已开设153个“微专业”。

安徽高校专业设置调整既做“加法”，又做“减法”。

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业”融合研究中心，围绕“产业、专业、就业、创业”融合发展，开展全局性、前瞻性研究，安徽对省属高校专业设置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建立学科专业“预警清单”制度，每年发布专业布局和人才需求报告，指导高校主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对就业率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点，依规逐步淘汰。

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安徽将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继续因时因势对学科专业“留、撤、调”，贯通“专业—产业—就业”最短通道，“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安徽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钱桂仑说。

（来源：《瞭望》2024年第47期、安徽教育网）

【专家论道】

刘振天：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向何方突围？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给教育评价改革作出的最新指向和定位，凸显了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早在2016年，教育评价改革就已提升到国家重大政策层面，纳入中央议事日程。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最高决策部门专门为教育评价改革出台文件，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总体方案》整体设计了以建设教育强国为根本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破“五唯”为关键内容，以分类评价为主要方法，以政府、学校、社会、师生为多元主体，以系统集成、政策协同、破立结合为基本原则的教育评价改革大思路大框架，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按照官方的说法，《总体方案》颁布三年多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教育评价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破“五唯”日益成为广泛共识和行动，政府层面配套改革的政策体系逐步健全，各地各校涌现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部分领域教育功利化倾向得到有效遏制。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教育评价改革是世界性难题”，错综复杂，方方面面利益相互缠绕，牵一发动全身，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和一蹴而就，既要下定决心、坚定信心，又要从长计议、久久为功。就大学教育评价而言，破“五唯”已现端倪和缺口，“五唯”之外增添了多维评价。不过，“五唯”与多维二者是何种关系？多维对“五唯”是取代还是仅为修补？多维评价是不是最佳的或最后的方案？在笔者看来，从“五唯”到多维，无疑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一大进步，但多维并不能完全替代“五唯”，多维也并非最佳和最后的改革选项。只有从“五唯”到多维再转向从根本上体现学校、学者及学术自我主导的“自为”评价，或者以“自为”评价为核心，充分汲取“五唯”评价的合理成分，充分利用多维评价，才能真正破解“五唯”评价怪圈，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突围，从而有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助推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一、“五唯”评价的功与过

“五唯”有着不同层面的所指：在《总体方案》里，主要是指“唯分数、唯文凭、唯升学、唯论文和唯帽子”，针对的是大、中、小、幼，党政、学校、师生、社会用人部门全口径教育评价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则经历了逐步演变及明晰化和确切化的过程。最早在2016年3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9号），提出克服“三唯”，即唯学历、唯职称和唯论文；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

评估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8]37号),提出克服“四唯”,增加了唯奖项;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针对高等学校专门发布《关于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教技厅函〔2018〕110号)提出要清理“五唯”,多了唯帽子。大学教育评价破“五唯”,最突出和最核心的,也是最关键要害的,当属“唯论文”,因为唯职称、唯帽子和唯奖项等,都是唯论文的副产品,是以唯论文为基础的,唯论文与其他“四唯”,主要是皮和毛之间的关系。

“五唯”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客观要求。具体说来,它是与人们对现代大学本质、职能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高等教育在应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激烈竞争挑战中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彰显紧密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仅仅是近一百年间的事。清末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也有所谓的“大学”教育,如太学、国子学、书院等,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教书或是道德教化的场所,却不知“研究”和“服务”为何物。即使在民国时期号称“研究高深学问”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也没有突出强调过“研究”。例如,当时这几所大学的校长聘请了若干名年轻才俊当教授,甚至任命其为学长,这些人中,有的没有大学文凭,有的没有著作文章。这种不拘一格选才用人的做法,被后人传为佳话。不过,这也说明,那时大学的人才评价,往积极处看,比较自由,注重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不以科研论文、文凭以及奖项论短长;往消极里说,人才评价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不规范,缺乏科学标准和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接过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极为薄弱的高等教育穷家底,并开始对其进行全面改造。同时,为了缩短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发挥新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党和政府即分期分批选择若干有条件的高校,将其确定为国家重点大学予以重点建设。直到80年代末,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接近百所。但是,长期以来,包括重点大学在内的高校,其职能以教学为主。所谓重点大学,其“重点”集中体现在它的教学或人才培养方面为其他高校做出示范和提供经验,而科研、学科建设以及论文发表等,在当时远未被人们予以重点关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亲自抓教育,做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一是恢复高考,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大学要搞研究,要评职称,并且教授和副教授内部还要分不同级别。1977年7月,他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指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要办成教育的中心,又要办成科研的中心”。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强调重点大学的“两个中心”。“两个中心”在当时也引起了知识界和教育界的热议。有人认为,“高等学校‘两个中心’的规定和确立,深刻地揭示了高等教育同科学研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准确地概括了国内外搞好高等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按‘两个中心’的要求办好重点

大学,做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两个中心”的要求深刻阐明了高等学校的本质规律。当然,也有不少人
对“两个中心”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科研中心会削弱教学工作,“学院维持教学都有困难,哪有条件搞科研”。邓小平同志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科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分析和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大势,适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号召科技界和教育界要向科学进军。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我国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自此,“两个中心”正式成为国家重大政策决定,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被前所未有的提上日程。

“两个中心”指向之下,科学研究的地位迅速提升,如何衡量评价科研成果水平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包括高校在内的科研评价处于盲目无序状态,既缺乏科学标准,又缺乏公正性与权威性,很多情况下主要看领导的喜好或者关系,人治色彩浓厚,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从事科研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历史选择了南京大学,该校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气,成为教育评价领域的探路者和播火者。南京大学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竞争,论文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要以SCI论文作为衡量教师科研成果水平的标准。今天,人们对SCI已觉平常,不再新奇,但在当时,这一举措却十分崇高而神圣。SCI(《科学引文索引》)创办于1957年,本来是国际上通用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可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权威性的**衡量论文水平的国际性硬通货**。南京大学首先制造了标准,当然也受益于标准。从1992年起到1998年,该校师生发表的SCI论文在中国大陆所有高校中连续8年雄居榜首,而所发表的SCI论文的被引用数,使该校从1994年起到1998年,连续5年成为全国高校的“领头羊”,力压清华、北大等一千重点大学。从1987年开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和教育部也将SCI作为衡量基础研究的一项指标,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年底公布上一年的统计数据,每年编制《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人们称它为中国大陆的“学术榜”。80年代后,中国的SCI论文发表数逐渐呈现指数增长态势,SCI在中国学术领域的地位更是“直上云霄”。当年,学者发表一篇SCI论文,不亚于今天在国际三大顶级刊物Nature、Science和Cell上发表文章,甚至出现百万重奖的场面。在其带动下,评职称、搞奖励、争项目、引人才、评院士、大学评估及学科排名等,无不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和刊物级别,由此逐渐演化成“五唯”评价。

如今,“五唯”已从过去的神圣殿堂滑落到被破除的地步,给人的感觉似乎一

无是处。然而，我们应以历史的观点和态度，以辩证的方法对其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和判定。必须承认，“五唯”对我国科研工作、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产生过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

其一，适应形势需要，拓展了高等学校的职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的正确路线，《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就要求教育不仅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还要多生产新知识和新技术。高校从以往单纯传授知识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转变为教学与研究结合并重，成为发展和创新知识的重要力量。

其二，显著激发了高校间的竞争氛围，扩大了知识生产规模和数量。围绕着论文、项目、经费、成果、奖励以及人才称号，高校之间和个体之间，乃至地方政府之间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五唯”成了高校办学水平、管理能力、事业发展、社会贡献的重要标志，大学排名、资源分配、人才流动、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无不与“五唯”挂钩，切实激发了高校办学活力，扩大了知识生产规模与数量。单就SCI论文产出而言，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所有高校全部论文产出数不及美国哈佛大学一所高校多，但到2010年已发展到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位论文产出大国。

其三，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五唯”评价，尤其是SCI论文评价，为高校找到了知识生产的国际可比参照系，从而使广大科技工作者按照国际论文范式、标准与程序从事科研工作，促进了高校教育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其四，促进了高校人才梯队建设及人事劳动制度规范化建设。“五唯”评价造就了一支数量庞大的高校科研大军，尤其是形成了一支为数可观的高层次人才梯队，同时改变了以往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管理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多劳多得、优劳多得、按绩效取酬成为新的劳动和人事分配政策。高校拨款、项目申报、岗位聘任、薪金待遇、职务晋升、人才引进、津贴奖励等，无不以“五唯”为重要评价尺度，高校事业单位管理展现出工程化和企业化趋势。

然而，“五唯”评价也导致了严重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评价方式简单粗暴、模式僵化，人们心态上急功近利，重研究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结果轻过程，重短线轻长线，重模仿轻创新。**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校办学规律、知识生产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破坏了学术生态环境，不利于学术健康发展，尤其是偏离高校立德树人根本目标，不利于国家科教兴国、教育强国长远战略的顺利推进。这恰恰是上至政府、下至高校和社会决心将“五唯”加以破除的根本原由。

二、从“五唯”到多维：修补抑或超越？

“五唯”评价及其弊端，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其中，**最先受到批评的是唯学历和唯文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濒临崩溃边缘走出来的中国，百废待举，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实现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等一系列目标，社会上很快扭转了读书无用论的不良风气，展现出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喜人景象，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分强调学历的问题：不仅看学历，还要看是本土学历还是外国学历，洋学历更被重视。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和反对，认为在职称评定和人才使用上，要重学历但不能“唯学历”，要坚决摒弃只看学历不看能力的“唯学历”现象，土和洋应不拘一格，一视同仁。此后多年间，人们对片面强调学历问题没有停止过批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适龄人口入学机会越来越多，升学越来越容易，学历问题受到的关注度开始下降。然而，由于职场竞争的加剧，唯学历又转换为唯高学历和名校学历，新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唯学历之后便是对唯职称和唯论文的批评。高校是专业性的学术组织，职称是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也是高校教师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反映。但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学术一片空白，职称评定不规范，存在着论资排辈和靠关系现象，影响了教师教学科研积极性、创造性。于是，打破这种现象，让人才尽快成长就成为高校职称评定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唯论文就是针对以往弊端提出的应对之策：**不比年龄和资历，只比论文产量、质量与影响，或者只以论文论英雄。这时，SCI评价标准便应运而生，相应地，论文刊物级别、影响因子也成为评价的重要标尺。然而，唯论文的不合理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如早在2006年，就有人呼吁高校人才评价切莫唯论文，要尽快建立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机制，鼓励具有创新精神、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得到应有的待遇。十多年前，破除唯论文的呼声开始高涨，人们认为一流大学不应以论文数量论短长，“唯论文论”该休矣。而实践中，许多地方也为破除“唯论文论”开了个好头，对科研人员评价不再唯论文是举，人们越发认识到唯论文的局限和弊端，认为唯论文危害之大超乎想象，甚至有人提到唯论文养活了庞大的产业，形成了利益链，论文被利益绑架，严重偏离了学术轨道。

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以及唯帽子等现象，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2012年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教育评价问题，特别是大学排名和职称评审问题，要求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2016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破除唯学历、唯文凭和唯论文。从这时开始，破“五唯”也上升到国家政策，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各地各校积极贯彻落实，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新的评价方式，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整体设计教育评价体系。我国高等教育评价起步

于改革开放时期，经过40余年的探索实践，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评价和质量保障体系。无论什么评价，都需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以师德师风为第一标准，把立德树人从软指标变为硬指标，从虚指标变为实指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领，建立大思政评价体系，实现三全育人全覆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探索分类评价新形式。“五唯”评价虽然包括文凭、职称、论文、奖项和帽子等多种形式，但实质上是唯数量和影响因子同一化的外在指标，不符合事物多样化发展实际。因此，破除“五唯”，必然要求分类评价。目前，我国高校根据地区、服务面向、学科专业等不同目标定位以及人才和教师工作性质、任务、岗位差异，设置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实行分类评价。如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教师分为教学型、科研型、服务型等，不同类型评价各有侧重，强调突出实际业绩与贡献。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置了多种评价赛道，如单独设置了教学型职称。有的教师因为教学效果好、得到学生好评，或者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立项课题、得到政府教学成果奖而破格提升职称；有的教师虽然按一般标准达不到晋升要求，但因为指导学生参加高级别比赛获奖、单项科研成果突出、带来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显著，也得到了破格晋升。

三是注重包容性、发展性、综合性和增值性评价。即不以论文产出等一时成果论英雄，进而着重考察评价长期发展潜力和综合发展状况。一些地方和高校在人才任期考核、职称评定中，综合教学态度、教学投入、教学效果、教学改革、学生评价、科研潜质、成果前景、同行评议、社会效益等，给人才发展留出弹性空间，有利于激励人才潜心向学，鼓励真才实学。

上述改革措施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变“五唯”为多维。从整体上来看，多维评价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必须承认，破除“五唯”评价依然艰难，一些地方和高校仍在继续强化论文、项目、奖项、帽子等，即使已经实施了多维评价，也多停留在表面形式。而实质上，多维变相成了“五唯+”，多维评价中的“五唯”依旧居于主导与核心地位，增加的其他各维度评价仅扮演着配角。不仅如此，一些高校反映，多维比“五唯”更加烦琐，更耗用时间和精力，并且评价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难以控制，又产生新的不公平现象。

为什么“五唯”很难破除？原因自然有传统惯习等路径依赖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则在于“五唯”评价本身蕴含着一定的合理性。

其一，“五唯”评价具有在思维上将事物多质性抽象为单质性的特点。无论是大学排名、学科专业排名，还是教师职称评聘，或者是人才引进和任期考核，在具体评价中，会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要素和信息，这些要素和信息在来源上纷繁复杂，在程度上千差万别，在形态上多种多样，缺乏一致性口径，对其质量和水平基本无法直接加以比较。在这种情况下，评价者必须善于从各种要素和信息中抽象出

某种共同的东西。“五唯”评价恰恰满足了这样的条件，它排除了众多评价物中各自差异化的特质，而从中提取出具有共性、高相关性的一般标准，这些共性的一般标准可以形式化和计量化，便于直观评价和对比。仅以论文评价为例，不管哪门学科、哪种形式的论文，评价者可以完全撇开论文所涉及的具体内容、观点、方法或结论建议，只需要考虑或计算一定时期内作者的论文产量、引用率、影响因子、获奖级别、刊物级别等相关因素，并赋予相应权重，便可得到质量或水平指数。其他各类教育评价，均可按上述方式如法炮制。

其二，“五唯”评价具有简约化、高效化和低成本化的优势。评价是一种管理，管理的本质总是与提高效率这种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在教育评价中，无论是评价主体还是评价客体，其背景、条件、思想、观点、利益、需要、兴趣、个性等不尽相同，要实现评价和比较的目的，就必须尽可能舍弃或消除有关人与事物的差异性一面，找出人们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点，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关键和共性，以此为基础设计评价指标和标准。如对领导干部的评价，在具体工作中便可分离出德、能、勤、绩、廉等指标；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评价，可分为师资队伍、教学投入、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指标；同样，对高校人才进行评价，也可分为育人、教学、科研、社会贡献等指标。分类评价的过程，既是分化过程，也是归类过程，前者强化了指标的多样性和针对性，后者则舍弃了事物杂多的成分。任何评价指标体系，无论多么细致，都不可能细化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方面和每一项工作，否则不仅会无限制地增加管理成本，甚至可能消除评价的可行性。要知道，人们面对的世界，已是经他们头脑分析之后形成的分门别类的图解化世界，或者说是观念化世界，不再是作为混沌整体存在的自然世界本身。语言和话语即是例证，任何一个事物被人们说出来或用概念表达出来时，便脱离了原来事物自身，成为那个被舍弃掉杂多的事物的抽象语词。客观的教育实践与我们研究和评价的教育实践并不同一。在西方管理界有“奥卡姆剃刀”的隐喻，说的是管理行为中，对那些无效的、无用的、多余的部分能够删减的要尽量删减，变成一种单质化或形式化的东西。“五唯”评价即舍弃了具体复杂的质料，留下的是可以分类、统计和计算的客观形式，由此教育评价才能顺利推进下去。这也是其他评价，如多维评价中的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等复杂性和主观性评价所无法相比的。这也就解释了多维评价依然无法取代并且依然依赖“五唯”评价的深层原因。

其三，“五唯”评价在价值上具有协调不同群体利益诉求，进而实现评价的相对公平与合理化的功能。众所周知，组织越庞大，内部就越复杂，这种复杂既源于各主体先天秉赋，如出身、条件、关系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也源于思想观念、价值目标和利益追求的不同，还有后天环境因素导致的区别。这些多维因素聚合到一起，往往使得教育评价难以把握和控制，因而评价中容易出现不公平现

象。比如评价中可能受到人情面子、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影响，而且即使没有此类影响，对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或者相同学科的不同成果，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行的。这也是同行评议制度常被人怀疑和指责的原因。而“五唯”则突出和侧重于量化评价，只计算数量或尽可能将相关因素转换为量化形式，避免了许多人情因素和质性因素的干扰。这种评价虽然问题不少，但人们仍然认为其最客观公正。在这一点上，“五唯”评价与高考问题如出一辙。

其四，实事求是地说，“五唯”评价也抓住了大学评价的核心与关键要素。大学办学复杂多样，就其职能任务而言，有教学或人才培养、科研、社会服务、国内外交流合作以及学生、党团工青妇、后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所有这些工作，无论如何千头万绪，都是围绕人才培养、发展学术、服务社会等最基本职能展开的，它们构成了学校的主干。“五唯”评价中，不管是论文和职称，还是奖项、课题和帽子，恰恰突出体现了学校工作的核心所在。因此，“五唯”评价才得以长期延续，即使在国家层面已经提出要破除“五唯”，但严格说来，人们至今并未找到替代“五唯”评价的最佳方案，尚未实现对“五唯”评价的超越。

三、走向自为:大学评价改革突围之路

“五唯”评价的本质是“一唯”，从“五唯”到多维，是评价进步的表现，也说明教育评价正在逐渐打破“五唯”一统的僵化局面，朝着教育评价本来面目的方向回归。虽然目前多维评价还在探索之中，尚只起着补苴罅漏作用，无法实现对“五唯”的超越，然而，从“五唯”转变到多维，实施多元化评价，显著拓展了评价维度，是教育评价改革大势所趋。

与“五唯”评价相比，多维评价或多元评价显然更为科学，也更加合理，**因为多维评价并不意味着抛弃“五唯”评价中相关核心指标、标准及其计算方法，而只是在“五唯”之外开辟了更多的评价形式及其内容，尤其是扭转了“五唯”评价中长期以来忽视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和特色发展这一根本方向的局面。**当然，相对于“五唯”评价，多维评价更复杂，难度也更高。如果说“五唯”评价侧重的是评价人的智力活动及其结果，具有客观性、可测性、可控性、可比性、高区分度和高稳定性，那么，多维评价则侧重于评价人的非智力因素及其结果，如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审美素养、综合能力、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等。这些非智力因素主观性强、差异性大、区分度与可比性低、复杂性高，数据零碎，缺乏连续性和统一性，无形中增加了评价的时间、精力、财力与心理等成本。如何提高对人的非智力因素及其结果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传统的物理性时空下，教育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直接交往的场所和机会总是有限的，由此，评价者所获得的有效信息、数量和质量也是受限的，要全面客观准确

地了解与把握被评价者，就要不断增加双方交往的频率和强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多维评价难以深入推展的主要原因。

当代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大大提高多维评价的可靠性。**现代信息技术革命性甚至颠覆性地突破了传统教育下人们生活和交往的边界，不仅极大拓展了教育的物理时空，更开辟出无边界的教育信息时空。在大时空之下，评价者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数据不再只靠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阅览室等有限的物理场合，也不再只靠人际交往中耳闻目睹等有限的感性印象以及平面媒体单一渠道，而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如全方位监测系统、通讯系统、神经网络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可穿戴系统、虚拟仿真系统等)，通过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的算法与强大的算力来收集有关现象或事物无限丰富和海量的信息，快速和精准地对其进行透视成像。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评价效率，也减少了信息缺乏或失真导致的评价误判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公。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不间断地观察、记录、收集和整理被评价者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等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任何行为数据，相对全面客观准确地推断被评价者的思想、道德、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而成为教育评价的有效工具。

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为多维评价开辟了广阔前景，但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还处在初步发展之中，本身尚不完善，上述的论述只是就理想目标而言的。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不是万能的。一方面，智能化机器所收集的数据尽管海量，但也仅是人的外显的行为化信息，这样的数据能否完全真实地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如人的道德、价值与情感，值得怀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再发达也不能侵犯人的私域生活，不可能更不应该全天候无死角地观察和记录被评价者在任何场所的任何行为。事实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多维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教育评价改革从“五唯”到多维并不是终点。如果说“五唯”评价所遵循和体现的是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信仰、实证主义原则、定量数理统计方法，导致了评价中见物不见人、平均主义、简单化、急功近利以及行政化弊端，进而造成“五唯”评价陷入危机困境的话，那么，多维评价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上述缺陷，体现了评价的人文性、主体性、实践性和生活性。然而，**不管是“五唯”评价抑或是多维评价，从根本上而言，它们仍属于外部评价，即由被评价者自身之外的组织所实施的评价。**外部评价者可以是政府、专业机构、独立第三方(如媒体)、基金会，也可以是学校、学术团体或自然人。不论是政府、学术团体还是自然人，**只要是外部评价，都会形成“评与被评”双方对立性的紧张关系。**虽然在理论上或者政策宣传上经常讲“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但现实中的外部评价总是证明多改进少，因为外部评价的主要功能在于检查、督促、监测、问责、评比，而这些功能又必然通过结果来证明。并且，外部评价总会左右和干预被评价者的行为取向，尤其

是评价结果关系到被评价者的地位、声誉、资源等切身利益，容易导致评价形式化、短期化和功利化，进而导致评价失真和变形。

教育学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即“教是为了不教”。**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养成学习者自我教育和终身成长发展的能力。**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评是为了不评。**教育评价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人们自我评价和反思的能力，形成良好的评价文化。**外部评价形成的是评与被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内部自我评价形成的则是我与自身“主主”一元统合关系。这里，“我”既是评价者，又是被评价者，二元对立关系在“我”“我”关系下消失和融合了，“我”把“我”的活动及其结果作为“我”的反思和评判对象，从而自我做出调整、改进和完善。进一步说，自我评价将以往的主客关系属性，改变为自我主体。主体性和能动性是自我评价的本质特性，从“五唯”到多维再到自为，评价的主体性转向了教育活动中自身。

内部自我评价的主体，既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个人。政府、高校、团体便是组织形态，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学者便是个人。政府、高校、团体等，仍然可以开展内部自我评价，但这时的评价，不再是或主要不是评价别人，而是**评价自己**。如果政府要评价自己制定的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执行状况如何，具体管理活动是否有成效，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当然可以通过其政策落实者或执行者，如高校、科研院所的教育教学、科研、服务以及相关活动的效果来验证。验证少不了向高校或科研院所收集相关信息，但其作用不是对高校或科研院所作评价。同样，高校自我评价也是如此，它也不直接涉及高校内部院系和个人的评价，依此类推，最终是师生或学者个体的自我反思性评价。政府、高校、院系、个人自我评价应该成为常态。如果这种反思性内部自我评价形成了，即表明建立了良好的评价文化。

由上可知，从“五唯”评价到多维评价，再到自为评价(即自我评价)，是**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也是破除“五唯”顽疾的突围之路**。自我评价也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理想评价。那么，大学为什么要提倡自我评价?为什么把自我评价看作教育评价的最后形式?自我评价是否过于理想而不可行?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回答。

首先说终极性的必然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社会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其意思是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直到真正揭示和把握了世界的本质规律，这时的外部世界将变成“为我”的世界，人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地从事实践活动，从此也就真正摆脱了外部世界附加于人类身上的各种限制。这说明迈向和实现自由自主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人类需要不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康德在“三大批判”中强调，个体的发展，包括道德发展，总体趋势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他律只是外在的手段和辅助工具，只有自律才是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同时，自律不是对他律、教化和规训的简单接受、认同、习惯化或自动化，而是主体价值的超越和实现。康德认为，启蒙主

义不是自上而下的教导、灌输和强制，从来不存在一个万能的上帝。马克思也批判传统的启蒙主义，认为传统启蒙主义思想和行动必然把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高在上扮演着真理发现者和“教师爷”的角色。而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在改造着自身，教育者需要受教育。“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真正的启蒙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是主体在实践交往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将这一基本原理和最终走向运用到教育评价实践中，我们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教育评价必将从外部评价走向内部自我评价。

其次现实性的必要性。大学是高度专业化和创新性的学术组织，自由、自主、自治是专业化和创新性的前提与保证。所谓的自由、自主、自治，就是说作为知识生产单位，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什么知识最值得生产，只有学校、学院和学者自己才最清楚、最了解。外部评价者，尤其是行政机构和市场没有能力替代大学，尽管现代条件下政府和社会也日益专业化。有人可能还会说，当下行政机构开展的外部评价也早已不是外部的了，而是行政部门借助专家进行的评价，是专业性的评价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本科教学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认证之类。而且从程序上看，评价方案、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方法与技术，都是专家研制的，评价过程是专家亲自操作的，评价结果是专家作出的。但必须看到，专家背后的真正主体、组织者和操控者是行政部门，评价目的方针、评价标准、评价导向、评价结果及其运用，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和意图，专家仅仅是专业化的形式化与外在化表现，况且政府依靠专家，专家已变身为行政机构的代理人，体现和执行的是行政官员角色。外部评价具有强制性、规训性和权威性，评价结果合理不合理、准确不准确，评价程序公正不公正，对高校办学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尽可能减少外部评价及其对被评价者的干预。**

对于师生和学者个体的外部评价，如“五唯”评价等，也应该加以破除，还给他们自主评价的权利。学术研究少不了外在支持，特别是在当代知识发展不平衡和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发展本国学术，保持学术领先地位或者实现快速追赶目标，普遍加大了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投入巨资开展有组织科研；企业部门也不断寻求与大学合作，显著扩大了知识生产规模，提高了知识生产效率和知识转化效益，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和繁荣。不过，与之相伴随，也出现了学术资本主义倾向，知识的中立性、真理性和专业性受到影响，学校变成了资本和谋利的工具，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公器作用正在不断下降。

“五唯”评价中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帽子等，单从形式上看，是学者或学术组织自我评价或内部评价的表现。专业论文一般都发表在本专业领域的专业期刊上，编辑人员也多是业内人士，何况期刊还要将论文送给同行专家盲审。职称同样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看似学术同行评议行为，却同样不能代替自我评价。在这

里，同行评议的目的并不在于平等地开展学术交流，而在于论文发表和职务晋级，偏离了学术自身，何况刊物、课题、奖项设立部门的级别变相成了衡量论文成果水平和质量的标准。论文发表和职称晋升中的各种不端行为，恰恰说明了这类评审的实质是地道的外部评价。

最后再说自我评价的可行性。从“评是为了不评”的终极目的看，理想的评价是学者或学术部门、学术同行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不是为了职称、发表、荣誉、地位等外在目的，而是纯粹为了学术交流和分享，为了知识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创新，为了师生发展和成长。事实上，每一位学者和科学家，都有一颗虔诚对待学术之心，他们都渴望在学术生涯和知识探索中作出一番贡献：或者是新的知识发现，或者是新技术发明，或者是新概念提出，或者是表达新的观点和见解。他们在从事知识生产或者教育教学活动中，对自我学术基础、学术积累、学术水平、学术成果创见、学术良知，对学术同行的水平、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判断，实际上是最清楚的；对其研究推进到了哪一步，取得了何种成效，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作出较为客观准确的评价，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存在着文人相轻或自视清高的心理，但不影响内部评价或自我评价的合理性与准确性。自我评价如果受到外部评价左右，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争夺利益的理性算计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夸大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和学术贡献，造成学术浮夸和泡沫。基于此，我们说，从“五唯”评价到多维评价再到自为评价，是真正回归学术本身，是大学教育评价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作者：刘振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质量管理与评价研究】

（原载《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5期）

张薇薇，王甦平：分类评价引导高校特色发展的上海实践探索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高等教育规模大幅增加，在学总规模从1990年的382万到2000年的1229万，2010年达到3105万，这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十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千校一面”的现象严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不能适应社会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从2010年中共中央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多个国家重要文件都提出了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科学定位和特色发展。尤其是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更是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2010年后，广东、浙江、吉林、江苏和上海等多个省（直辖市）行政区域陆续推出高校分类发展和评价的指导性政策，以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为例，2014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制定《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2014—2020年）》，指出“遵循高校分类管理、分类发展思路，引导高校立足校情实际，编制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随后上海市级层面发布多个与高校分类相关的文件，直至2018年，上海市教委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上海高校分类管理评价，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指导意见》，由此标志着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完成，同年推出《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试行）》，开始对上海62所高校进行评价。

在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转变的历史阶段，分类评价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能更好地研究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路径，本文选取开展分类评价时间相对较早、高校类型相对较全的上海作为研究范例，从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设计理念和特征等方面，分析高校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发展的路径。

一、分类评价引导高校特色发展的理念分析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五大职能为基础，在坚持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的原则上，以“十二宫格”的分类模式，设立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四种类型高校的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四类型共性指标涉及价值导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特色发展等方面，包括党对高校的领导、立德树人、教学保障、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办学特色案例等内容，共计13个指标，占总指标的40%左右。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在指标设置上兼顾共性与个性，通过设置可选权重指标、高校特色案例指标，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和展现机会，激发高校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特色发展。

1. 强化分类发展理念，推动高校变“回顾性分析”为“前瞻性研究”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十二宫格”的分类模式、四个高校类型的分类，蕴藏着引

导高校特色发展的理念。学术研究型高校引领科学研究的发展，解决卡脖子问题；应用研究型高校在应用和研究领域寻得平衡发展的空间，在应用领域不断开拓新世界；应用技术型高校与企业发展相结合，立足于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应用技能型高校专注于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与企业、行业紧密结合。在指标的设定上也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比如设置双师型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比例等指标，目的就是引导应用技术型高校和应用技能型高校做大做深与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共同培养企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学院的教师，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促进开展面向实践的研究。这些指标的落实能提升我国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评价只是一种方式，不是目的，高校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最重要的目标便是能够实现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希望高校能够变“回顾性分析”为“前瞻性研究”，在深刻理解分类评价指标导向的内涵上，将结果导向转变为主动谋划，将相关指标内容融入学校的发展规划中。学术研究型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布局解决卡脖子问题。在专业布局方面，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指引下，设置复合型交叉专业，培养交叉创新人才。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型高校不断加强错位发展的理念，立足技术、技能的特色发展，如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不断完善“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推进校企合作机制；在专业设置上，以特色专业群为依托，新设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相关专业，加强与行业的结合。各高校在分类评价的引导下，立足本类型的特征，不断扩大自身的优势，实现了错位发展。

2. 立足高校职能，把培养特色人才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任务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在人才培养的指标数量和权重的设置上将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在指标数量上，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均有人才培养类指标12个，占总指标数量的36.4%；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指标体系中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指标共15个，占总指标数的42.9%。在指标权重上，学术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人才培养类指标的权重均为44分，占总分的44%；应用技术型指标体系中人才培养类指标46分，占总分的46%；应用技能型指标体系中人才培养类指标共47分，占总分的47%。四种类型指标体系中人才培养类指标的权重均将近总分的一半，可见，分类评价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工作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在指标调整过程中，增加了立德树人、教学质量保障等相关指标的权重。由此可见，分类评价通过指标内容和权重的变化，引导高校在各自类型的定位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同时，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仍积极引导人才的特色培养，根据不同类型培养的人才不同，设置相对应的个性指标。学术研究型高校培养学术型人才，注重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一流学科的建设情况；关注学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及推动成果转化的能力；更加注重国际化建设，关注国际学生培养情况。应用研究型高

校以培养应用研究与开发的人才为重点，更注重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优势学科的集中度；关注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注重国际专业认证的情况。应用技术型高校以培养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型人才为主体，以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与行业的能力、双师型、企业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等相关指标为其特色指标。应用技能型高校主要培养专科层次的操作性专业技能人才，学校的职业性更强，以特色专业的设置、学生实践课时、专业教师企业实践、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相关指标为特色指标。

在分类评价的引导下，各高校充分认识到人才培养的短板，实现了相应的突破。以学生获奖为例，经过分类评价的推动，高校逐渐重视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在学科领域不断崭露头角，尤其是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高校，部分学校通过将学生获奖纳入评优评奖，不断引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的职业技能大赛，近两年高校参加比赛获奖的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人才特色、错位发展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位列学术研究型，上海中医药大学位列应用研究型，上海健康医学院位列应用技术型，经过这几年的摸索，各自均走出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尤其是上海健康医学院着力于全科人才的培养，为基层医疗机构输送相关人才，大力推进医疗器械的研究和相关方向的人才培养。

2018年上海开始对62所高校进行分类评价。兼顾高校基本的办学职能，以及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将高校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四个类型。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以40%的共性指标和60%的个性指标不断促使高校高质量发展。敦促高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任务；引导高校推进同城协同合作；促进高校理清学校发展数据，推动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的建立。在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的引导下，各高校制定了形式各异、极具特色的提升方案，不断提升专业特色，加强人才的特色培养，提升学校内部评价水平，深刻认识和定位学校的发展方向，实现学校的特色发展。

二、分类评价助力高校管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2023年是开展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的第六年，在分类评价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分类评价的结果、指标应用到学校的发展规划中，分类评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高校管理的方式。

1. 理清学校发展状况，将外部评价标准科学地内部转换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是由政府主导的一项评价工作，对于高校而言，这是来自“外部”的评价。鉴于高校的不同特色，“外部”的评价通过分类等各种方式不断适应和引导高校的发展，但评价终究不能完全契合高校的“个性发展”，因此，高校在面对外部评价指标的要求时，应该兼顾外部评价需求和自身发展需求，建立符

合学校发展的评价导向体系，不能将评价的指标内容生搬硬套到学校的发展过程中，不顾实际地对学校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考核，否则会对学校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设立自选权重指标、办学特色指标，就是希望能够引导高校正视自身发展的方向和特色，但如何将分类评价的特色理念落实到学校实际发展方向上，不仅要求高校能够深刻理解分类评价的引导意义，还要依靠高校对自身现况和需求的理解程度，将外部的标准要求做内部化转换，要跳出评价框架来看待学校的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磨合和调试的过程。在分类评价指挥棒的引导下，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多个高校立足学校的实际需求，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将分类评价的考核指标或考核结果纳入学校的绩效考核中，推动学校层面和二级学院的考核，不断完善高校评价体系，扩大分类评价结果的运用范围和力度，推动高校在特色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2. 影响高校评价指挥棒，推动学校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

高校分类管理的有效传导与落地，实为对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大检验与大提升，是提升高校办学理念、改进高校工作方式与能力的一个重要契机。一方面，高校分类评价首先通过以评促建、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推动学校在同类型高校中建立对标，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从而进行内部评价机制改革，制定符合学校特征的发展框架和规划，理顺学校的管理机制，充分调动二级学院、职能部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评价工作与学校各部门数据的准确度息息相关，对学校理清自身发展现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是对学校数据治理能力极大的考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有数据库支撑的高校，不论是填报数据的压力，还是数据缺失的情况都会大大减少。

因此，分类评价是引导高校发展方向的重要指挥棒之一，只有在学校充分理解分类评价深层次内涵和意义的基础上，才能将指挥棒有效地落实到学校的管理中去，切实将分类评价的导向与学校内部治理相结合，推进学校能够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只有这样，分类评价的存在才具有实际意义。

通过上海高校分类评价工作的推动，各高校开始逐步理清学校内部数据，摸清家底，探索学校数据平台的建设。同济大学建设了相对完善的集成化院校研究数据系统，包含学校内部的业务数据和学校外部相关的评价数据，实现了数据整合和数据分析的功能。在分类评价的推动下，不断完善自身底层数据，同时为分类评价数据的填报赋能。上海大学同样也注重大数据综合管理及可视化平台的建设，构建了包括数字化环境、数字化办学、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保障四个维度的高校数字化发展指标体系，从数字战略、制度体系、平台建设、技术支撑、数据安全、数字素养等方面系统提出了大数据赋能高等教育的实施路径和发展方略。

三、反思与展望

我国高校分类管理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开展了四十多年，期间评价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为了能给与高校多样化的发展建议，应该将评价的发展性和增值性也融入分类评价中。在全球教育、科技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下，高校分类评价任重而道远，需寻求一条打破常规、具有创新精神的道路。

1. 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力仍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应始终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需求相一致，因而教育评价要不断自我完善，才能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虽然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根据政策文件不断调整评价内容，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更新机制，未能有效量化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要求。因此，评价指标要进一步增强导向性，引领高校对接国家战略、上海城市建设的需要，充分适配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以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核心、以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的评价机制”，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满足上海市高等教育布局的需求。

2. 不同类型高校间的特色指标不够凸显

高校分类评价最重要的目标是引导高校特色发展，但评价指标体系中共性指标达40%，而60%的个性指标并不完全能够突出不同类型的特色，如“教学科研平台”指标，学术研究型为“国家级”，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应用技能型为“省部级及以上”，指标的特色性并不突出。因此，需不断加强不同类型高校特色指标的研究，立足上海市高等教育的现况，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合理分配高校共性指标和特色指标的比例。

3. 引导和促进高校特色发展的方式和力度仍需加强

虽然目前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结果已经与资源配置挂钩，提升了高校对分类评价的重视程度，但仍存在挂钩力度不够的问题。部分高校对分类的理解不深不透、对自身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够清晰，认为研究型高校地位高于技术、技能型高校，从而对自身的分类不认同，盲目追求研究型指标，主动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动力仍显不足，对学校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在结果反馈阶段，除了为高校提供一校一报告、告知其排序和得分情况以外，仍需加强对结果的深入分析，从实处为高校找到发展的痛点、难点。同时，应从上海市级层面加强评价后的督导工作，协助高校梳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引导高校实现特色发展，激发高校的发展活力。

4. 分类评价经验总结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尚待提升

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经过六年的发展，评价结果已相对固化，尤其是部分高校在所属类型中排名落后的情况尚无法实现突破，易形成自暴自弃的状态，致使分类评

价的激励作用有所下降。因此，需创新分类评价结果呈现和运用的方式，不断加大分类评价现况的总结和分析，以及加强个案研究，深入剖析部分高校发展所遇的困境，并推动对该类高校内生动力的路径研究，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高校的特色发展和实力提升。

高校分类评价意义重大而深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上重要的助推剂。通过多个省市的探索和实践，高校分类评价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教育评价如何体现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和需求，是一个需要长时间研究和检验的课题，更需要政府层面和高校层面通力协作，才能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原载《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4年第4期）

【审核评估专栏】

审核评估限期整改！多所高校交出答卷

新一轮审核评估进程已过大半。根据要求，高校应在评估结论反馈30日内，制订并提交《审核评估整改方案》。原则上要在两年内完成整改任务并提交《审核评估整改报告》。目前，已有多所高校马不停蹄进入限期整改阶段。

◆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4年10月12日，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汇报会。各整改任务牵头单位负责人对所牵头任务的整改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困难、下一步工作计划等进行了详细汇报。

副校长严功军指出，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各单位对标对表《四川外国语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扎实推进评估整改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据悉，该校根据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和专家访谈交流提出的问题，以及学校自评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归纳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并多次组织相关单位及负责人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形成了《四川外国语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并于今年5月审议通过。



整改任务安排共涉及七大方面具体28个问题。学校针对每项整改任务都从主客观因素等方面逐条分析问题原因，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分工、整改时限和预期成效。

例如在课堂教学方面，针对信息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不够深入，课堂教学使用的方法与手段较为传统的问题，四川外国语大学提出三条整改措施：一是将数字化教学有机融入课程大纲编制，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有机融合；二是加大学校教改立项对数字化专项的倾斜和支持力度；三是有针对性地强化教师高效运用信息技术和创新教学方式能力的训练，持续推进教师实验室教学设备使用培训。

再如在质量保障方面，针对质量持续改进机制还不够完善，检查、评价以后的持续改进效果不明显的问题，学校提出举措，一是落实OBE理念，完善持续改进成效的评价制度和机制，强化各类教育教学检查、督导、评价结果的分析应用与再评价。二是通过激励和督导强化基层教学组织在教学质量的基础性地位，使质量提升“小循环”切实有效运行，与学校质量提升“大循环”协调运行。

此外，还有多所高校正扎实推进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做好审核评估“后半篇文章”。

◆ 上海交通大学

2021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主动承担第一类审核评估试点，接受全面体检；同年9月圆满完成专家入校评估工作。近期，麦可思研究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朱燕民教授进行线上讲座《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实践与思考》，分享该校整改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并重点对该校采取整改措施及主要成效进行介绍。

据悉，学校依据《自评报告》和《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逐项认真梳理研究专家提出的和自评自建查摆的问题共31个，形成“问题清单”，并围绕问题从进一步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完善新时代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行动、实施以“四大计划”为代表的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四大方面提出整改措施。

◆ 安徽大学

同为试点单位，安徽大学作为全国第二类第1种（B1）“学术型”高校唯一代表，率先接受了新一轮审核评估。整改工作中，学校将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7个方面的宏观建议与32个微观问题相结合，形成77项整改措施及《安徽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台账》，以综合改革思维落实专家组建议，以整改问题为导向扎实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与实现路径，把持续改进与当前的工作、与学校的长远改革发展结合起来，与学校的战略规划同部署、同推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助力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

◆ 武汉理工大学

本轮审核评估中，武汉理工大学作为实践探索“全程线上不入校”可行性试点高校，按照线上评估考察方式开展。自启动评估以来，专家组采取线上方式全面审读评估报告、调阅材料、听课看课、访谈座谈，通过对本科教育质量数据驾驶舱、线上实验实践教学资源、教育教学平台的全面考察验证，形成了评估报告及问题清单。

今年3月，学校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专项会，对照新一轮审核评

估专家意见交流会反馈的问题及建议，列出《问题清单》和整改工作任务，明确主要牵头部门和整改工作进度及时间表。副校长麦立强强调，学校已经将审核评估整改工作纳入2024年工作重点，各责任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对接国家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符合国家战略需求。

◆ 湖南工业大学

今年10月11日，湖南工业大学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推进会。根据《湖南工业大学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工作安排，审核评估整改工作各牵头部门负责人分别对照各自负责的整改问题，就前期整改工作中所采取的整改措施、取得的整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情况进行了汇报。

副校长于惠钧肯定了各部门前期整改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了各部门在落实整改具体工作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尤其是对大思政与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高水平学科专业带头人的引进和培养、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度及利用率的提高、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评价机制的完善、学生优良学习及行为习惯的养成、学生体质测试达标率的加强、双创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等重要问题的整改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 西安科技大学

西安科技大学于今年1月31日召开了校长办公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审核评估中立德树人、强基固本、转型升级、教学投入等重点问题，并审议通过了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及审核评估整改任务落实清单。

4月12日，学校召开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推进会暨学术型人才培养论坛。会上，教学质量监督评估中心主要负责人解读了学校制定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方案，以及推动整改工作的立德树人、强基固本、转型提质、课程课堂、综合改革、质量文化和优生助学七大工程。学校强调将以审核评估整改为契机，提高人才培养效果与学校目标定位的达成度，努力打造和实施学校“一流本科教育工程”。

新一轮审核评估全面对接新时代教育评价、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要求，引导督促高校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本科人才培养规律，聚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我们期待更多高校以评估整改为契机，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本科教育教学典范，引领我国高教发展。

（来源：麦可思研究）